

第一章 风雨沧桑路

生 在 南 洋

1842年7月20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新加坡合都亚南的一家杂货铺内传出了一阵“哇哇”的婴儿啼哭声。接生婆擦着双手，向守在门口的一个中年男人连连道喜：“恭喜你，伍阿彰，你又添了个儿子！”伍阿彰闪身走进铺内，妻子余娜正用充满母爱的柔和目光注视着刚出生的小男孩。

给儿子起名取号，自然是父亲的权力和义务。伍阿彰经过一番斟酌，最后总算敲定。从此世界上便多了一个“姓伍，名叙，字文爵，号秩庸”的人。

伍叙即本书的传主伍廷芳。据目前所见史料证实，伍廷芳三字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1877年6月22日(清光绪三年五月十二日)，清朝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在英国联名上书朝廷保荐伍廷芳，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提及伍廷芳的史料。从此，在官方文献中，伍廷芳遂即取代了伍叙而广为人知。

伍廷芳，广东新会县(今新会市)官来桥(黄家楼)人。父亲伍社常又名伍阿彰，早年只身一人跨海闯南洋谋生路。粤人赴

南洋正如北方人闯关东，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于重土安迁的中国人来说，飘荡海外，自是迫不得已的举动，大凡在故乡能够勉强维持生计的人是不愿出此下策的。只有那些家境一贫如洗，难以为生的人，或遭受封建官衙、劣绅迫害的人，才会顶着种种压力，带着吉凶未卜的念头，冒险出洋。新加坡自 1842 年《英荷条约》签订以来，即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大片荒芜的土地亟待耕垦，迅速发展的工商业贸易提供了众多的佣工机会。伍社常便加入了粤人在 19 世纪前浩浩荡荡的南洋谋生大军，开赴新加坡。

伍社常是精明能干的。初至新加坡，他为人帮工，靠着吃苦耐劳，渐渐积累下一笔资金，然后由此转作小本生意，开起了一家杂货铺。因经营有方，家境日渐好转。娶妻生子自然是水到渠成。妻子余娜，是一个中国客家妇女、基督教信徒，经常到当地的教堂去守礼拜，在圣歌、圣诗中忘却尘世间的烦恼、劳顿，寻求精神上的乐园，祈求圣主保佑家人的平安。

幼年时代的伍廷芳是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的。当他把稚气的眼光投向世界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绿树参天的景象。造物主的情有独钟，酿造了新加坡这个终年花草盛开、绿树成荫的绿色王国。信奉基督教的母亲以其举止言行，向孩子们灌输着真诚、善良、友爱的做人之道。父亲的终日劳作，则向孩子们展示着：欲求收获，必先勤苦的成功秘诀。环境、家庭，常常能够影响人的一生。从后来伍廷芳取得的辉煌业绩及其崇尚自然的性格特征看，早年的环境教育、家庭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孩提时代的伍廷芳决没有想到，在他刚刚降生时，他的祖国正经受着一场起自英伦三岛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凭借着坚船利炮的淫威，维多利亚女王的子民们正沿吴淞口溯江西上，直插中国腹地。在他刚出满月之时，英国侵略军的头目璞鼎查已率

军逼近南京城下，强迫道光皇帝的全权代表耆英、伊里布签订城下之盟。“天朝上国”的神圣灵光，在枪炮的轰鸣声中，如同肥皂泡般飘没在硝烟弥漫之中。几千年来中国人苦心构筑的“夷夏大防”的万里长城，也在英国人的汽笛声中轰然倒塌。中国正处于千古未有的奇变中。伍廷芳更没有想到，他的命运会同祖国的走向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命运之神早已给人分配了历史的重荷，尽管他（她）最初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

时代呼唤着新人的诞生，备遭凌辱的祖国母亲期盼着优秀儿女的横空出世。

智 脱 匪 巢

在拒绝同化这一点上，中华民族堪称世界民族之最。多年的海外生活，并没有淡化迁居异国他乡的中国人的“中国情结”。正如唱红海内外的《我的中国心》的歌词所言：“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歌曲明白无误地唱出了数百万海外中国人的心声，道出了他们绵绵无期的思乡之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深深眷恋，促成了众多海外游子去实践落叶归根的传统说教，构成了一幅出国——归国的动态图。

1845年，一艘发自新加坡的轮船，在汽笛的长鸣声中，缓缓驶进广州湾，靠岸抛锚。码头上顿时繁忙起来。招呼声、拉客声、叫卖声，汇成了一曲杂乱无章的众人大合唱。在吵杂声中，伍社常挈妇将雏，走下轮船。面对着四周熟悉的一切，伍社常真想放声高喊：故乡啊，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儿子伍廷芳却远没有父亲那般激动，一双机灵的眼睛怯生生地观注着陌生的周围，充满了好奇心，嘴里不停地向母亲询问着什么，似乎要把他将长期居住

的地方搞个明白。

时年，伍廷芳刚好 3 岁。

定居广州市郊芳村，圆了伍社常的思乡梦，但动荡的时势，却没有让他找到一方净土，去过朴实宁静的生活。

19 世纪 40—50 年代，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派惊人的混乱状。封建专制统治下长期淤积的社会矛盾以巨大的能量向四周喷射着，最终以惯有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方式展现出来。从遥远的大西北、大西南，到波涛汹涌的东海之滨，从黑水白山的东北三省，到清澈见底的珠江流域，全中国皆陷入动荡之中，其中尤其以经受第一次鸦片战争洗礼的华南地区最为显著。破落的穷秀才洪秀全以其罕有的洞察力，将从传教士手中接过的《圣经》故事，经过一番巧妙的包装、拼凑，创立了一个名为“拜上帝会”的反清组织，汇集了一大帮贫穷无望的穷哥们、姐们，打出了创建“太平天国”的旗帜。义旗一举，应者云集。这支叫化子式的军队从僻远的广西金田村出发，竟然连获胜仗，清朝的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无不丢盔卸甲，望风而逃。1853 年，太平军在横扫华南数省如卷席的声威中，一路浩浩荡荡开进了江南重镇——南京，建立了一座人间“小天堂”。

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冲击，清王朝在南中国地区的统治几近崩溃，社会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盗匪横行，流寇遍野，打家劫舍，司空见惯。家境宽裕的伍家自然成为土匪洗劫的目标。灾难就这样悄悄地降临到了伍家。

1855 年，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一伙强人闯进了伍家，不由分说，拉走了刚从熟睡中醒来的伍廷芳，临走时扔下一句硬梆梆的话：“拿钱来赎人！”

家人的哭喊声，夹杂着狗的惊叫声，融入了寂静的长夜，显得是那般凄惨，那般绝望。

歹徒们用黑布紧紧蒙住了伍廷芳的双眼，推搡着行走。不知摔了多少跟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伍廷芳只记得先走的是陆路，后又坐上小船，划过一条河流，最后又在岸上行走了好一段路程。当他实在走不动时，匪徒们停住了脚步，取下了他眼上的黑布。此刻，已是黎明时分。伍廷芳揉搓了一会眼睛，方看清周围的环境。他们住脚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山洞。山洞的四周环绕着崇山峻岭，山上皆是绿郁葱葱的树木，如果不加注意，外面很难发现这个洞穴，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洞内则别有一番天地，容积极大，大约能容纳下数百人。四壁全是天然巨石，坚固无双，洞口却只有 5 尺宽。借着射进来的阳光，伍廷芳看到 30 多个土匪，或坐或卧，放肆地谈笑着，个个都是头缠黑布，手里拿着一根短竹筒，随着腮部的鼓瘪，嘴里喷出阵阵白烟，顿时洞里充满了呛人的烟雾和土匪们的咳嗽声。

伍廷芳坐在石头上，不声不响，只有机灵的双眼在闪烁。

“开饭啦！”

一声猛喊，打断了伍廷芳的思绪。奔袭了一夜的匪徒们，起身涌向饭桶，洞内传出一阵阵“呼啦，呼啦”的吃饭声。

“小家伙 这是你的！”

伍廷芳抬眼望去，只见一个伙夫模样的人，递过一碗米饭。此人一副老实胆小的模样，在这群强悍蛮横的土匪中显得格外扎眼。伍廷芳不由得一阵心动，到口的话又咽下肚里。

饭吃完了，土匪们打着饱嗝，叫骂着，横七竖八地找地方睡觉去了。洞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伍廷芳靠在石壁上，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一觉好长啊，等伍廷芳醒来时，天已经漆黑了，洞内燃起了火把。这时，一个虎背熊腰的土匪，走到伍廷芳身边，盘问他家里的情况。伍廷芳答道：

“我的父亲、哥哥是种田的，我替人家放牛！”

土匪头目盯着伍廷芳狠狠地看了一会儿，转身离开。

不知又过了几天，伍廷芳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惊喜。一次开饭时，老伙夫同人说话的口音竟同自己完全一样，伍廷芳不由得一阵狂喜。等到众土匪离去时，伍廷芳悄悄地问道：“老伯，您不是某乡的么？”

伙夫惊讶地说道：“你怎么晓得的？”

“我听您说话，就知道了。我也是某乡的。和您是同乡。您到此地有几年了？”

伙夫屈指算了一下，幽幽说道：

“6年了。我也是被掳来的。因家里没有钱，我也没得气力，他们就要我烧火做饭。我看你不像庄稼人，怎挨得这里的苦。”

听了伙夫的话，伍廷芳心中好一阵悲伤，哽咽着说：

“我吃苦倒不要紧，只是家中父母一定急得不行了，还请老伯设法救我。再说您藏身贼巢，毕竟不是长久之法。如果您肯救我回家，我保准您吃一辈子的安乐饭。”

伙夫的脸上露出几分喜色。洞口传来脚步声，伙夫匆忙嘱咐：

“不要再说了，等有机会，我会再和你商量的。”边说边抽身离去。

从此以后，伍廷芳装得跟没事一般，再也不理会那伙夫，以免引起匪徒们的怀疑。就这样，30多天慢慢地过去了。

一天，匪徒们又出动了。洞里只留下两个土匪监守。见伍廷芳乖乖地坐在石上，守班的土匪便放松了警惕，懒洋洋地走开了。

伙夫悄悄地走近伍廷芳，低声说道：

“机会到了，可不知如何下手。”

伍廷芳想了一会，耳语道：

“用酒灌醉他！”

那天，伙夫显得格格外勤快，宰了两只鸡，烧了一盆猪肉，开

了一坛酒，笑嘻嘻地对土匪说：“几十个人堆在一起，没一天痛快的饱醉过，难得有今天这个好机会，我们何不来它个一醉方休！”

两土匪望着眼前的美酒佳肴，一副猴急相，连连说道：

“对！对！难为你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个不醉不休！”

说罢，三人就开杯问盏，狼吞虎咽起来。伙夫乘机提议划拳喝酒，两土匪不知是计，欣然从命。在一阵狂喊乱叫中，土匪显出了关公相，已是醉意朦胧。伙夫又出新花样，一人领酒一圈。几碗过后，土匪难胜酒力，就地躺倒，呼呼大睡起来。伙夫仍不放心，高声叫喊，使劲推拉，两土匪皆如死猪般毫无反应。伙夫又找来铁链，锁住两土匪的手脚，然后拉起伍廷芳飞也似地跑出了山洞。

转过了一道弯，翻过了一座山，来到山脚边，远远望见一个小村落，俩人赶到村里，从村民的口中弄清了方向。然后，走啊走啊，实在走不动了，俩人便雇了一艘小船沿河疾驶。

两岸的景色越来越熟悉，伍廷芳突然猛叫：

“快看 那就是我们的村啦！”

停船靠岸，千谢万谢，道别了伙夫，伍廷芳快步疾行。

“妈，我回来了！”

度日如年的伍家老少，惊喜万分，家人围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起来。

远 遁 科 举

伍社常是为了让子女接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而举家回国的。家庭在伍廷芳身上寄予了殷切希望，父亲引经据典为其起的“名”“字”“号”所带有的寓意均已清晰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归国后的伍家，在经济方面肯定要比乡里四邻宽

裕得多。这可以从 1877 年伍社常病逝后留给伍廷芳的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遗产中得到证明。但问题的关键是它决不能表明伍家的社会地位就比其他人的高出多少。在中国这个几千年来一直以农业为本的国度里，素来就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历朝历代皆将“商”列为四民之末，所谓的“士、农、工、商”是也。衡量中国人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并不在于拥有财产的多寡，而是看其在官僚阶层中官职的高低——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拥有万贯乃至亿万家私的贪官污吏。伍社常海外谋生，多有积蓄，归国后充其量也只是个“土财主”。从“土财主”到能够光宗耀祖的“豪门望族”还有一段非常遥远的距离。而在当时的中国，唯一能够衔接两者的就是科举制度。因而，伍廷芳也就成为数百万科举大军中的一员。

在从新加坡回国到 14 岁前往香港求学这段时间里，伍廷芳也与同时代的中国孩子们一样，进入私塾，研读四书五经，去追逐一个步入社会高层的梦想。

然而，并非所有的封建时代的读书人都能最终实现这一追求，也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乐意去从事这种呆板、乏味的事业。尤其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在对外民族战争中的惨败，已经引起了众多有为青年对“天朝上国”及其统治方式的怀疑。得欧风美雨风气之先的华南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荡平了数百年的混乱后，英明君主隋文帝励精图治，大胆创新，首倡科举制，影响中国历史至深至远。科举取士制度是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的一次革命。它打破了家庭出身对人才的限制，为众多有为青年步入社会的高层提供了一条门径，实现了人生的追求与价值，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举世无双的文官制度。大唐天子唐太宗就曾满怀喜悦之情说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可以说，盛唐时期的繁荣，是与科举取士制度的发展完善密不可分的。但是，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走向极端，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经蜕变为

封建统治阶级实行独裁专制的强有力手段。科举制已经由隋唐初创时富有改革气息的举措，变成了明清以降扼杀人才的桎梏。考生在答卷时，不仅内容不出朱熹的《四书集注》，且行文格式也有严格的规定，即通常所说的“八股文”。“八股文”形式呆板，内容空洞，陈陈相因，千篇一律。数以万计的仕子们，为求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毕生皓首穷经。有限的青春，流失在翻书诵经之间。到清朝后期，科举制度更加腐败，连试卷的字体也必须是“小楷”。千军万马能通过独木桥的毕竟是少数。为数不多的金榜题名者，也远非社会急剧变革中的有用之才，大多迂腐笨拙，思想僵化，缺乏新意，既不能济世，也不能救民，甚至“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科举制度已经走向了绝境。废弃科举，成为中华民族追赶时代大势的必由之路。远遁科举，成为华夏儿女报国成才的明智之举。

孩童时代的伍廷芳聪明异常，读书一目十行，一览不忘，但对科举高中，兴趣索然。一入私塾，伍廷芳便在先生摇头晃脑的“子曰，夫子曰”声中昏昏欲睡，为此不知挨了多少打骂。每天放学后，他都有一种小鸟出笼般的兴奋。此刻，伍廷芳常常跑到街里书坊去阅读子书、史鉴和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是他十分喜欢的书籍。后来，他曾对人说过，平生受益皆来自这里。

先生的打骂自然会激起学生的反抗。伍廷芳下决心捉弄先生一回，发泄心中的愤怒。有一次，秀才先生布置的作文题是：“不归杨则归墨”。伍廷芳心想，若抄袭名家之作，先生很可能看出，自己做，又没兴趣。正当他左右为难时，突然想起了《红楼梦》第八十回贾宝玉作的“则归墨”三字，心中不觉一阵狂喜，于是就把破题的原文（“言于舍杨之外，若别无所归者，夫墨非欲归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则舍杨之外，欲不归于墨得乎！”）完

全照抄。先生竟然破天荒地表扬了伍廷芳。有趣的是，后来先生参加乡试的题目也是“不归杨则归墨”，就把伍廷芳的作文照录了一遍，居然瞒过了主考，中了举人。此事过后，伍廷芳就更加不信科举了。他常说，章句帖括之学，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在他兼任西南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长时，有一秘书，爱治小学，与人谈天说地不过三句话，就炫耀起他的说文解字工夫，某字如此如此的来历，某字这般这般的意思，唠唠叨叨说个没完。长此以往，伍廷芳实在不耐烦了。有一次，正当秘书得意之际，伍廷芳插嘴问道：

“治小学究竟有什么意思？”

“有趣得很。比如母亲的母字，本来是女字出来的，内里多加两点，算是女子的乳房，意思是女子有乳哺孩子，就可以为人母了。”秘书忙不迭地讲解着。

“照你这么讲，怪不得父亲的父字，上截是八，下截是又。这又字就是生意人家的四字，上下合拢起来，就是八四。一个人到了 84 岁，难道还不应该作老子吗？”^①

秘书羞得满脸腾红，从此再不敢当着伍廷芳的面炫耀他的说文解字工夫了。

从伍廷芳终生所具有的知识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熏染是肤浅的。他早年所接受的传统文化仅仅是子书、史鉴、小说之类。伍廷芳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为他尔后系统接受西方教育提供了一个不坏的基点，便于对异质文化的认同。

伍社常是开明的。他本想让儿子苦读经书，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为此他不知规劝过多少次，甚至责骂过，但看见伍廷芳就是不上路，也就只好死了这份心思，另为儿子指点一条出路。再

加上，广东局势动荡，盗匪横行。为防止再生不测，伍廷芳逃脱匪巢后不久，伍社常就把他送往香港，接受西式教育。

伍廷芳由此踏上了西学之路。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踏 上 西 学 路

1856 年，伍廷芳带着父母的殷切期望，在亲戚陈言（又名陈蔼亭）的陪伴下，来到香港求学。伍廷芳一生中最辉煌的历史由此拉开，他将在此积蓄能量，去攀登人生的高峰。时年 14 岁。

实际上，伍廷芳在去香港之前就已经开始接触到了西洋文化。在不去私塾读书授业的日子里，伍廷芳除了去街坊书市翻阅史鉴、小说外，还时常到家乡附近英国人创办的福音教堂听牧师传经布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也就同牧师晏惠林熟了。老牧师对其沉思冷静的性情，和吃苦好学的精神极为欣赏，经常为他讲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艺术等情况。每次讲完，伍廷芳都要静静地坐上好一会儿，脸上流露出向往的神情。后来老牧师又教其英语，并称之为交给他一把打开西洋文化知识宝库的金钥匙。

从此以后，芳村的人们便时常看到，在教堂内或教堂外的草地小路上，一老一少缓缓行走，一个循循讲授，一个用心背诵，且发出谁也听不懂的怪音来。

大约半年后，晏惠林老牧师有一次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伍廷芳，缓缓说道：

“孩子，你天赋极佳，半年来你的英语长进不少，但只听我一人讲授，并非善法。要攀上西洋文化的知识高峰，你必须到香港去，到英国去，接受系统的西洋教育。如果同意的话，我准备给我在香港的老朋友白利安牧师写封信，让他来关照你的学习。”

伍廷芳用劲点了点头。老少俩人相拥而别。

1856年，伍廷芳带着晏牧师的推荐信，在陈言的陪同下，来到了隔河相望的香港。

白利安牧师热情接待了伍廷芳，把他介绍到圣公会所办的圣保罗书院就读，后又转入皇后大书院学习。

圣保罗书院由港区英国圣公会殖民地随军牧师尹史丹顿于1843年12月22日创立，1850年落成，归首任香港会督司蔑主理，1851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新生。学校对学生免费提供住宿。1872年2月17日，《中外新闻七日报》发表纪念该书院主理司蔑文章时，曾详述了圣保罗书院的创办过程，称曰：创办当初，华人子弟入学者甚少，为此学校规定，凡入该校就读的学生，校方免费提供寄宿、衣服及部分补贴。

明清以来，大批肩负向东方传播基督圣教的传教士远涉重洋，踏入中土。由于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传教士们便采取一种投其所好，急其所急的折衷策略，在迎合中国统治者和中国普通黎民百姓心理的过程中，达到其最终的文化渗透目的。以学者的姿态，向当权者讲授、传播西洋近代科技，博取欢心；以慈善家的形象，对百姓乐善好施，免费教育。西方传教士在华设立的第一所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就是这样创办起来的。免费就读甚至还略有补贴，对于无力进入私塾读书的贫寒家庭的子女，无疑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被称为“中国留美学生之父”的容闳就是在这一前

提下，进入马礼逊学堂，并于 1847 年跟随勃朗先生走出国门留学美国的。称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能是后来者，而敢于步其后尘，身体力行者则更是少数。在容闳接受异质文化之后的数十年内，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并没有得到如期的蓬勃发展，他们依旧靠揣度大部分中国家庭贫寒子弟求学的心理，投其所好，招收寒门子弟入学。绝大多数读书人对洋学堂表现出的仍旧是不屑一顾，羞与为伍。1862 年“京师同文馆”开办风波，19 世纪 70 年代首批留美幼童选拔的窘迫，均已一览无余地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洋文化的排拒心理，展现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历程的艰难。但令中国人无奈的是：国门既然已被打开，关起门来，重温闭关锁国时代的春秋大梦已是万不可能。不请自至的欧美列强已经纷至沓来，相继登堂入室。严酷的事实提醒国人，欲图民族的生存必须勇于面对现实，敢于接受挑战；欲图民族文化的再兴，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参与文化间的交流、冲突与融合，在比较甄别中，剔除传统文化的糟粕，吸取西洋文化的精华，重新铸造一种更富生机与活力的民族新文化。否则，等待国人的只能是绝路一条。

伍廷芳在香港圣保罗书院接受的是全新的近代教育，史称“治英文、算学、格致诸科”。其对八股帖试的厌恶在此找到了乐土，聪颖的天资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每次考试，伍廷芳均名列前茅。为表彰其杰出的才学，昭示后人，1911 年圣保罗书院特设“伍廷芳纪念堂”。

每门具体的课程，均体现了民族进化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精神内涵，折射出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取向、理性思维。算学、格致等声光电化学科，实际上是对欧洲文明的高度凝缩和体认，反映了西洋文化的特质，昭示着人类文明演进的曙光。它同清王朝统治下的八股取士制度在培养人才、陶冶情操、追求人生价值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在前者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才，无论是

道德理想、价值旨趣、知识结构，都同科举制度下熏染出来的成功者迥然不同。历史已经证明且将再次证明，只要假以时日，担当起民族振兴，统帅古老华夏文明走向新天地的重任，将会历史地落在大批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上。

理性化、系统化、专门化的教育，促使伍廷芳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从 14 岁至 20 岁，是一个人思想观念逐渐成型、强烈聚敛的阶段。其中，学校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学校作为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文明得以继续传播的重要途径，成为在华西人公开宣扬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主要场所。

1861 年，伍廷芳以优异成绩毕业。此时，他已经是一个具有全新知识的且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新式知识分子。西学知识构建了伍廷芳在未来岁月投身中国近代化运动、改革封建制度、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主共和的坚实基础。

中国办报第一人

伍廷芳就读的圣保罗书院虽然是教会创办的一所神学院，但是其所设课程已经基本世俗化。早在建院之初，英国外交部就每年向该校提供 250 英镑，作为港英殖民地政府培养传译员和翻译人员的经费。因而，当 1861 年毕业时，才华出众、相貌堂堂的伍廷芳经严格挑选被录取为香港高等审判庭译员，月薪为港币 80 圆，折合成英镑，年薪为 200 镑。至此，伍廷芳开始学习西洋法律。

从 1861 年毕业涉足政界起，到 1874 年自费留学英国止，伍廷芳连续在香港生活了 13 年。在此期间，伍廷芳最值得追颂的是：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日报——《中外新报》。

《中外新报》的创办，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是偶然与必然的

巧合。

根据传播学原理，报纸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走向一体化的重要媒介。它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承载着文明社会的成果。英国人在侵占香港之初，便极为重视报业。香港第一份报纸《香港政府公报》是 1841 年 5 月 1 日出版的，此时距 1 月 25 日英军强行在香港登陆，仅有 3 个多月的时间。1842 年 3 月 12 日，《中国之友》报，又译为《华友西报》创刊。3 月 24 日，上述两报合并改称为《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1843 年 6 月，《东方世界与商业广告报》问世。同年，英国人于 1827 年 11 月在广州创刊的在中国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广州记录报》迁往香港，改名为《香港记录报》。1845 年 2 月 20 日，以主笔德臣命名的《德臣西报》创刊；8 月 30 日，《中国之外友》面世。1857 年以主笔孖刺命名的《孖刺报》面世，这是香港第一份英文日报。这些报纸在传递政府政策、广播商业信息、反映商人市民利益诸方面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人的示范作用，再次赢得了敏锐的中国人的青睐。正如史书记载：“自西洋报纸输入中国，开人智慧，映入眼帘，知新之士，渐次仿行。香港为开风气之先。”这便是伍廷芳萌生创办报纸念头的缘由之一。

香港华人经济势力的崛起，是伍廷芳创办报纸的经济动因。19 世纪 60 年代，全球经济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势头，为香港地区经济繁荣提供了契机。北美大陆、澳洲大陆相继传出发现大量金矿的消息后，全球刮起了一阵规模宏大的“淘金旋风”。在发财欲念的驱动下，数以万计的华人纷纷飘洋过海，应招奔赴淘金场。与这股流动人口相伴随的还有大批被贩往古巴、秘鲁等美洲各地的“猪仔”们。地处东西交通要道的香港成为外运的主要港口。为躲避战乱迁往香港的两粤富绅，利用香港四通八达的航运线，架起了一座座通往世界各地的桥梁，把远洋贸易和中国沿海贸易衔接

起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滚滚的财源。到 19 世纪 60 年代初，在港华人已达 8 万之众，华人的财富远远超过洋商而成为香港财政收入的支柱。反映华人利益，表达华人心声的第一份报纸——《中外新报》，便在华商大力发展转口贸易的行进中呱呱落地。

开民智，宣民力则是伍廷芳决意创办报纸的最深层原因。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禁绝了中国民间社会表达心声的正常渠道；一家一户为主的自然经济体制，窒息了原存于人类中的初创力和想象力，制造了一群木讷、呆板、守旧闭塞的芸芸众生，举国上下弥漫着一层沉沉暮气。长存于黎民百姓思想中的只是狭隘的地域观念、宗法意识、家族主义，而恰恰没有近代国家公民应有的国家观念、民族主义和理性爱国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浩劫，皇朝国都惨遭涂炭，而广袤的中国内地无动于衷、我行我素的最好诠释。先贤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世宣言，顿成空穴来风。近代百年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将开民智，鼓民力，铸新魂作为救亡中国的第一急要。创办报纸，制造舆论，唤起民众则成为首选方案。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直到毛泽东，概莫能外。而作为此辈的先驱，立下过筚路蓝缕之功的第一人当属伍廷芳。其子伍朝枢说过：“先严慨国势积弱，由于民智闭塞，乃与友人创办中外新报于港，大声疾呼，振聋发聩，为吾国日报之鼻祖。”此话不假。在伍廷芳创办《中外新报》之前，中国虽然有号称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但它只是封建专制朝廷政策、人事升迁的内部通讯，其宗旨、形式均无法与近代意义上的报纸相提并论。即使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主持出版的《澳门新闻报》，也只是外国报纸资料的编译，仍不能称为近代意义上的报纸。伍廷芳主持创办的《中外新报》，实是中国人主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它在中国新闻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